

Daxue Linian Zai Zhongguo

大学理念在中国

王冀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大学理念在中国

王冀生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朋 友 重 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理念在中国/王冀生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04-023387-2

I. 大… II. 王… III.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957 号

策划编辑 丁艳红 责任编辑 王建强 封面设计 于文燕
版式设计 张 岚 责任校对 朱惠芳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e.com
印 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landrace.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5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0 000	定 价	16.6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3387-00

内容提要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一种哲学思考体系,核心主要是回答“大学是做什么的”、“什么是大学”、“怎样办大学”和“办什么样的大学”这样几个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近年来胡锦涛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遵循教育和大学的本质及其规律,从宏观的高度、历史的轨迹和文化的视角认真总结了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关键,开创中国教育和大学创新新局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对大学理念进行再认识;大学理念在西方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儒学教育理想;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竞争中建设若干所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下大学组织的文化个性;当代中国强烈呼唤新一代教育家群体的崛起。

本书可供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和政府教育官员以及广大大学教师、教育管理干部、教育理论工作者学习、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和培训大学校长、教育管理干部、政府教育官员的教材。

序

写序,对我来说,是苦事也是乐事。为了写序,就有“先睹为快”的优先权,逼使我去认真读书,至少要浏览全书并精读若干重要章节,领悟作者殚精竭思的研究成果,还得深思熟虑地写出一点学习心得。庸俗的溢美非我所愿,苛求的评价会得罪作者,四平八稳的泛泛之谈有隔靴搔痒之嫌,最好能阐发书中的精华或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这样,既可以增长知识又能引发思考,有时还可以透过书背后研究作者的思想发展历程和思维方式。就我所知,即将出版的这本《大学理念在中国》,是王冀生同志近20年来出版的著作和主编的专著的第10本。这10本书的出版顺序反映了他前期的论著主要是对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在讨论现实问题中阐发他的理论观点;后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科基本理论研究,着重于从文化的角度探索大学的精神,在学术探讨中含蕴现实经验。把认识论的理性思维与政治论的现实功利结合在一起,成为他后期著作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他集教育官员与教育学者于一身的特殊身份及其思维方式。

《大学理念在中国》这本专著的特点,不仅把理性思维与现实功利结合起来,而且把西方大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探讨与教育方针政策宣传结合起来,古今中外的教育观点并陈,思辨方法和质性方法并用,熔为一炉,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贯穿全书的主线,我的理解是:作为观念体系的大学理念,是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是以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根本,吸收西方“注重理性,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曲折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走“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创新和谐发展”的道路。

理念,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的上位性、综合性的哲学概念,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韩延明,《大学理念论纲》,2003)。大学理念也就是指人们对大学为何的理性认识与大学何为的理想追求(赵婷婷,《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及协调》,2005)。大学办学是需要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的,对大学的理性认识与理想追求形成了一定的观念体系之后,这种观念体系及其价值指向

本来应当对办学行为起引导作用。但是,遗憾的是,在当前,不论是西方或中国,这种美好的理想都很难付诸实践。在西方,“注重理性”虽然是大学教育永恒的主题(本书第二章),但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大学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中国,更受行政体制的严格规范所制约而举步维艰。理念与现实的矛盾,使许多有理念、有作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们深感困惑。

为了化解这个矛盾,王冀生同志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一个简明而精辟的见解:“大学办学活动的基本矛盾是崇尚学术与适应社会之间的矛盾,大学办学的基本规律可以表述为‘必须与学术和社会协调发展’,大学应当在办学实践中努力实现崇尚学术与适应社会的辩证统一。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以大学办学模式的多样化去应对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在主动应对文明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广泛需求的同时坚持大学应有的基本的理性和学术价值”(本书·前言)。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可能会给予办学一定的自主与自由的空间,或许这就是当前解决矛盾的可行途径。

本书的编写,就是做苦乐并存的作业。谨此就正于作者与读者。

潘懋元

于2007年7月大暑日

前言

我国的近、现代大学是个舶来品，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移植和生长在中国这块历史土壤上的，因此，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近年来胡锦涛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宏观的高度、历史的轨迹和文化的视野认真总结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关键，探索中国教育和大学创新之路，是长期以来我的一个心愿。我也深知，进行这项研究绝非轻而易举，不仅时间跨度很大，而且历史难点很多，不下一番认真的功夫，肯定是搞不好的。但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探究真理的学者情怀，驱使着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知难而进，撰写了这本《大学理念在中国》。

一、对大学理念进行再认识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一种哲学思考体系，核心主要是回答“大学是做什么的”、“什么是大学”、“怎样办大学”和“办什么样的大学”这样几个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是撰写《大学理念在中国》的理论基础。

1. 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问题，核心是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问题，是深刻揭示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实践基础。众所周知，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教育责任作为自己应当承担的永恒的第一社会责任，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教育责任一直是大学实际承担的唯一社会责任。由于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当代，大学正在全面地承担着教育责任、学术责任、服务与引领社会责任和国际责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中，核心和重点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

2. 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人类有三种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相应的三种社会机构:一是物质生产活动,广而言之就是经济活动,它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二是治理国家和国际交往的政治活动,它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事这种活动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政党;三是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文化的文化活动,它是人类社会全部活动的基础,从事这种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人类的这三种基本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相应的三种社会机构,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它们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由此可见,在宏观上,与主要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府、政党不同,大学是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主要从事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文化活动的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由于文化不仅是多样化的还是有层次的,大学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的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高深学术,因此,更准确一点地说,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一切大学现象的根本出发点。

3. 大学必须与学术和社会协调发展

自大学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会中去以后,大学的存在就有两种哲学基础和拥有双重价值: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要求大学必须“崇尚学术”,注重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淀和创造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大学存在的内在价值;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哲学要求大学应当“适应社会”,主动应对文明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既服务于社会又引领社会前进,这是大学存在的外在价值。由此可见,大学办学活动的基本矛盾是崇尚学术与适应社会之间的矛盾。大学办学的基本规律可以表述为“必须与学术和社会协调发展”,大学应当在办学实践中努力实现崇尚学术与适应社会的辩证统一。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以大学办学模式的多样化去应对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在主动应对文明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广泛需求的同时坚持大学应有的基本的理性和学术价值。

4. 大学应有的文化品位、独立精神和价值追求

从根本上说,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承担着两个方面的使命和任务: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大学既承担着培养社会所要求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又负有养成健全的人格、开发人的理性和潜力、革

新人的天赋、扩大人的生命内涵、为人的一生奠基的使命；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大学既承担着传承文化和将科学技术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任务，又负有批判性地发展知识以更新、扩大文化遗产的使命。这就是说，大学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往往是超越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无论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还是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大学的价值既有功利性的一面又有非功利性的一面。大学应当而且可以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思想、理性和学术的力量，特别是大学特有的着眼未来的批判精神，促进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大学应该努力超越功利性与非功利性之对立，探寻一种能够兼容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二者都能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远见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否则，大学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主要是基于学术，学术价值是大学存在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大学之所以能够承担如此重大的社会责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是因为大学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淀和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学术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和大学环境文化的总和，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包括凝聚力、教育力、创造力和引领力，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办学和承担重大社会责任的根本。尤其是在当代，由于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交融日益深入，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这样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的兴衰与大学的兴衰紧密相关。只有普遍增强众多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成为世界大国，只有重点增强一批高水平和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成为世界强国。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大学要求生存、求发展、办好学，承担起重大的社会责任，为增强国家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做贡献，就必须实行文化（学术）兴校的发展战略，全面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淀和创造深厚的文化底蕴，构筑高品位和富有活力的和谐校园文化生态环境，确保大学真正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哲学既是智慧的科学又是科学的智慧。“文化是大学之魂”是在我国大学文化问题研究思潮深入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种崭新的大学哲学观。作为一种崭新的大学哲学观，“文化是大学之魂”中的“文化”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其核心是一种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

学之魂”。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千年来西方和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变革的实践证明,始终把“人的发展”作为大学教育活动永恒的主题,永远坚守以“象牙塔”为象征的为真理而献身的大学固有的独立精神,这是在社会世俗化、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大学能够超越功利与非功利的对立,确保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都能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大学之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生命线之所在。这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和境界,我们应当为达到这种崇高的理想和境界做坚持不懈的奋斗。

二、中国大学理念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出现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之中,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难时刻,发展于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振兴的伟大时代。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一个极其错综复杂和跌宕起伏的过程,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评价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的历史地位、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价值和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功过是非,是撰写《大学理念在中国》的核心和重点。

1. 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我国,孔子儒学一直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价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重大话题。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长盛不衰,就在于她有伟大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教育理想、制度和体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教育之根,中国传统教育又反过来推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应当充分肯定,以“天人之学”、“变易之学”、“会通之学”和“中庸之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以“贵仁、重礼”为核心的孔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是我国对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早期的探索成果,“伦理道德”是做人

的根本,“注重养成”是教育的根本,“贤人治国”是办学的根本。因此,从汉武帝到清朝晚期,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以及相应的科举制度和书院教育,对养成我国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长期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培育着它的人民和精英,造就了大批志士仁人,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伟大篇章,是中国大学理念伟大宝库中的一块非常珍贵的瑰宝。但是,如果以“以人为本”的教育哲学观为指导进行分析,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是有历史局限性的,特别是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兴起以后,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忽视现代科学技术和固守封建宗法制度,因而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社会和我国教育、大学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对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应当采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态度,使其与现代化相结合,发展中国大学理念和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

2. 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从清朝晚期到民国时期我国建立和发展的近、现代大学既是从西方引进的又在客观上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所以,长期对其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价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价值,就成为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又一个重大话题。经过研究,我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以“科学,民主”为主要内涵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迫于内外的双重压力,1905年晚清政府终于做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重大决策,“从科举到学堂”是20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划时代变革。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和竺可桢为杰出代表的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鲜明的大学意识的新一代大师群体和教育家们经过短短20多年的艰苦努力,不仅在近代中国积极传播以“注重理性,学术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效法西方为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积极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使之与现代化相衔接,发展中国大学理念和创造中华民族新教育的探索。特别是抗战后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高扬“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坚持“会通中西”的新文化观,创造了“西南联大”的光辉业绩,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从而在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中国大学理念伟大宝库中的又一块值得珍惜的瑰宝。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些近、现代大学既是从西方引进的又在客观上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就给予全盘否定。我们还要看到,正是这些近、现代大学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和“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导致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民族抗日高潮的兴起,功不可没。遗憾的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深刻影响和1937年以后我国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使其与现代化相结合,发展中国大学理念和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这个世纪性难题在此期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在曲折中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功过是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基本否定的,有些人非常怀念民国时期的那一段辉煌;另一种态度是基本肯定的,主张采取历史的、分析的态度,我们倾向于后者。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的历史地位和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价值采取了不适当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使得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探索走了一段比较大的弯路,但是,必须充分肯定,建国初期,毛泽东在解放区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进行教育改革试验的基础上,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走自己的道路”的正确方针,包括“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教育改革试验,并在1961年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尤其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体系”,促使我国教育和大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步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是中国大学理念伟大宝库中一块来之不易的瑰宝,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又一次划时代变革。但是,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原因,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体系”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既缺乏对教育和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深刻理解,又有官僚化的行政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的深刻影响,以致真正意义上和具有现代意

义的当代中国大学理念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形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两千多年来,从孔夫子到蔡元培再到毛泽东和邓小平,我国历代教育家、学术大师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对探索、发展和创新中国大学理念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中国大学理念伟大宝库中的瑰宝,是我们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和发展当代中国大学理念的坚实基础。

三、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撰写《大学理念在中国》的根本目的。回顾总结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大学理念,必须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走中国教育和大学创新之路。

第一,由于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促进人的发展的活动,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所以,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化选择问题,文化选择的本质是在多元文化矛盾运动中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文化选择的运行机制是在文化批判和取舍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整合和创造。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理念在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发展中国大学理念,必须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文化变革”与“政权更迭”以及“宗法人伦”与“自由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我国近、现代大学不仅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我们经历过一段较大的曲折,出现过一些重大的失误,所以,从总体上说,至今我国大学仍然落后于西方,表面看来主要是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其实关键在于理念和制度上的差距。在理念上,主要差距是大学精神的滑坡和办学目标的功利化倾向。在制度上,主要差距是政府至今仍然直接控制着大学,没有建立起“开放、多元、竞争、有序”的大学格局。追根溯源,问题主要出在我国对教育、大学的本质及其规律在认识上存在着众多的误区和官僚化气息至今对我国大学的侵袭仍然十分严重。在认识上的主要误区是缺乏文化育人的高度自觉和鲜明的大学文化意识。官僚化气息对我国大学的严重侵袭主要表现在重行政机制轻文化个性,大学缺乏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活力。

因此,时代强烈呼唤我国实现新的文化觉醒和进行制度创新,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关键,走中国教育和大学创新之路。

第三,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关键,走中国教育和大学创新之路,必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自主创新和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正确认识和处理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文化个性的多样性、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文化发展的创新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为人民服务以及文化归属的民族性与文化联系的世界性的辩证关系,走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自主创新之路。当前,要特别警惕在世界范围出现的一股“文化霸权主义”逆流,它妄图把“全球化”的概念泛化到文化领域,进行文化渗透,为实现其全球霸权服务。必须明确,在文化领域内根本不存在“全球化”问题。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建设具有不同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大学理念,是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应当做出的唯一正确的文化选择。

第四,“中庸之道”的实质是一种“和谐哲学”。先秦时期的《大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开创了我国探索大学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历史先河。历史的脚步已经跨入21世纪,现在的情况较之两千多年以前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今日,我们不仅要在大学教育中进一步体认和实践我国先秦时期《大学》倡导的“大学之道”的基本精神,还要科学总结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理念在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创新“大学之道”的科学内涵,力求明德与崇学、亲民与新民、多元与卓越、与时俱进与止于至善的和谐发展,并赋予其深刻的时代内涵,使其既能指明今日中国教育和大学改革创新的方向,也能代表当今世界教育和大学改革创新的潮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战线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近年来胡锦涛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以人为本自主创新和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遵循教育和大学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行新的正确的文化选择,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使其与现代化相结合,探索当代中国大学理念和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建立“开放、多元、

竞争、有序”的大学格局,在竞争中建设若干所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下大学组织的文化个性,以理念创新为先导,以制度创新为关键,开创中国教育和大学创新新局面。

四、时代强烈呼唤中国新一代教育家的崛起

两千多年来,中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就是“学而优则仕”。中国的读书人向来都是以获得一官半职为荣耀,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官吏都是以政治为马首,唯政客的脸孔是瞻,这种官僚化气息和官本位思想对我国大学的侵袭十分严重。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伟大贡献,不仅是使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创新。1922年,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一个学者的良知,提出了“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的主张。这是中国几千年教育史上第一位学者发出的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呐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应该承认,由于封建社会的深刻影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官僚化的行政体制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官僚化气息和官本位思想对我国大学的侵袭至今仍然十分严重。主要表现是:

第一,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按政府的指令办学。在我国,政府至今仍然直接控制着大学,把大学视为己有,要求大学按政府的指令办学。1985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仍然没有真正得到完全落实,我国大学至今依然缺乏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活力。

第二,大学等级直接与行政级别挂钩。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由此可见,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是由它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决定的。用提高大学行政级别的办法来提高大学的社会地位,是我国官僚化的行政体制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不仅大大降低了大学的社会地位,而且便于政府直接控制大学。

第三,大学内部的运行机制几乎完全行政化。在大学里,人们崇敬的是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服从的是客观真理,应

当实行以学术为主导的运行机制。可是,在我国,由于官僚化气息对大学的侵袭十分严重,大学内部的运行机制几乎完全行政化,一切都要听命于大学领导和校部机关。这个问题不解决,广大知名教授和学术权威的学术权力无法得到保障,他们治学育人的主体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第四,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官员化

大学校长是个崇高的岗位,他们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理念独到和作风民主,是大学文化,特别是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人格化的象征。在我国,党委书记是党的光辉形象在大学这个基层组织的具体体现,承担着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学得到贯彻实施的神圣使命,领导和监督大学办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问题主要出在我国把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个人等级直接与行政级别挂钩,不仅使这些学者、教授和院士统统成了官员,大学的“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也难以得到实施。

既然官僚化的行政体制对我国大学的影响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难道我们还不应该痛下决心彻底地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吗?改革的根本出路何在呢?一要变“权力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二要坚持大学组织的文化个性,三要把教育事业交予教育家。最近,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地总结了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理念在中国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做出的一项新的重大决策,为在我国坚持由教育家办学开辟了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战略意义。为了促进当代中国新一代教育家群体的崛起,有必要在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改革大学校长以及相应的党委书记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建设,既要积极试点,又要谨慎从事。

两千多年来,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是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的确立,第二次是以“注重理性,学术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第三次是在曲折中逐步形成的以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大学理念和创造中华民族新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在马克思

主义,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近年来胡锦涛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我国新一代教育家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必将到来,我国必将出现第四次探索当代中国大学理念和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的新高峰,我国必将实现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战略性转变。

经过近一个时期以来的研究和思考,这本《大学理念在中国》即将问世了,实现了长期以来的心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这本书能够受到广大读者们的欢迎。在这本书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岂之、王英杰、方惠坚、赵存生、胡显章、王霖、陈怡诸位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这本书研究的问题涉及面广,难度很大,错误和分歧在所难免,我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们能够不吝赐教,给予批评和指正,共同开创我国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和中国教育、大学创新新局面。

作者

2007年6月